

《人民至上：中国共产党百年奋进丛书》专题之三 | “中国共产党百年‘三农’思想”

百年“三农”思想的演进与实践探索

■ 顾海英 王常伟

成果介绍

《从耕者有其田到乡村振兴——中国特色“三农”道路的探索与发展》一书以史实为依据，以时间为脉络，从农业、农村、农民三个视角，梳理总结、分析凝练中国共产党“三农”发展实践、成就、经验与思想。立足点是：以研究促进对“三农”发展历史的认识，彰显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推动“三农”发展的使命，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道路，促进中国“三农”领域的深化改革与乡村振兴。

本书采用“总—分—总”的模式，共有5篇16章。其中，绪论篇有2章，主要从总体上分析中国共产党百年“三农”领域的政策演进、思想变迁以及发展经验等；农业篇有5章，主要从中国共产党工农关系认识、粮食安全思想实践、农业经营制度变迁、农产品流通制度演进以及农业税收与支持等方面，对中国共产党党的农业政策实践与思想进行梳理和分析；农村篇有4章，主要从中国共产党城乡关系认识、农村土地制度、农村经济、乡村治理等方面，分析中国共产党百年乡村建设、发展政策实践与思想变迁；农民篇有4章，主要从中国共产党对农民阶层的认识、推动农民就业与流动、农民扶贫增收、城乡公共服务等方面，梳理和分析中国共产党百年以来涉及农民的政策与实践，并总结促进农民发展的相关思想等；展望篇，主要对中国共产党“三农”实践与思想进行总结与展望。



农为邦本，本固邦宁。习近平总书记说：只有深刻理解了“三农”问题，才能更好理解我们这个党、这个国家、这个民族。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百年，是中国社会沧桑巨变的百年，也是中国“三农”不断发展进步的百年。理解百年“三农”的思想演进与实践探索，必须从历史观和全局观角度，深刻领悟中国共产党为广大农民谋幸福的初心使命，深刻领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思想的目的论和阶段论。

中国共产党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而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就是要实现人的全面解放，建立一个让大多数人可以分享发展成果的社会。建党之初，占90%以上的农民不但是中国社会阶层最主要的构成，还是绝对弱势群体；即便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中国农村人口仍占80-90%。因此，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必然也代表最广大农民的利益。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将解放农民、让农民共享革命成果作为首要任务。中国共产党“一大”通过的党纲指出，要消灭阶级差别，废除资本私有制；中国共产党“二大”制定的党的最高纲领也指出，建立工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共产主义社会。这都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初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成立以后，充分认识到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把为农民谋幸福作为重要使命。

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而社会主义最终要实现共同富裕。1955年毛泽东深刻阐明了社会主义改造的目的在于共同富裕。改革开放以来，先后产生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都对社会主义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进行了阐述，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思想的目的论。

不断追寻发展、追寻变革、追寻改善

中国共产党百年“三农”思想与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密切相关，其思想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过程演进、发展、升华，体现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中国共产党百年“三农”思想的实践探索，也是一部坚守初心使命，结合不同历史阶段现实及其变化，不断追寻发展、追寻变革和追寻改善的历史。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的主要理论成就包括农村包围城市以及“三农”发展理论，具体的实践是以土地革命为中心，通过打土豪、分田地以及土改等举措，解决中国农村土地分配不均等问题，以实现耕者有其田，农民得解放。

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时期，基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确立的从农业国走向工业国的全局战略目标，中国共产党发展了“三农”思想，其思想核心在于“三农”改造，主要通过推

进土地的公有制与生产的合作化运动，完成了农村社会主义改造，为“三农”的后继发展奠定了所有制基础，也使农业基础设施得到了较大幅度提升，更为国家的工业化、城镇化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解放思想，从认识上明确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进而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思想，其思想核心是以市场机制促进“三农”发展，并通过农村制度变革，放活激活各类要素流动，优化资源配置；通过渐进调整二元结构体制机制，取消实施千年的农业税，逐步确立城乡统筹发展和以城带乡、以工补农的方针政策；通过开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促进“三农”的全面发展。

百年“三农”发展成就与未来展望

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发展时期，以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立足新时代特征，基于五大发展理念，形成了以乡村振兴为统领的“三农”发展思想，其思想核心是进一步深化改革，确立城乡融合发展，创新激活“三农”新活力，并通过政策倾斜，致力于补齐“四化同步”的短板，补齐农业农村发展的短板，增强“三农”发展的弱项。

中国共产党“三农”发展实践取得的成就，也为世界难题的解决提供了中国方案。从粮食安全来看，中国用世界上不到9%的耕地，不到7%的淡水，生产了世界上25%的粮食，养活了世界上20%的人口，为世界创造了辉煌和奇迹；中国的粮食生产、储备、支持等粮食安全体系，为小农经营为主体的国家提供了经验。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这不仅为中国全面实现全面小康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也意味着中国提前10年实现了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确定的减贫目标。中国共产党标本兼治的精准扶贫举措，为世界提供了减贫的中国方案，彪炳史册。从城镇化发展来看，城镇常住人口持续增加，且城镇化快速但平稳有序，没有像其他国家转型期那样，出现大量的无业游民和贫民窟现象，这也为发展中国家的城镇化发展提供了经验。

在奋力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和“三农”工作重心历史性转移之际，中国共产党已对新发展阶段的“三农”工作进行了谋篇布局，从已颁布的系列文件可见，中国共产党将坚守初心使命，将“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举全党全社会之力推动乡村振兴，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

（作者分别为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上海财经大学财经研究所研究员）

■ 专家点评

把握中国工农城乡关系演变的内在规律

高帆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启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征程。与其他国家相类似，中国的现代化是在农村人口和劳动力占主体、且农村人口主要从事农业的背景下起步的；与其他国家相区别，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具有关键支撑作用。从梳理历史脉络、把握当前状态、研判未来趋向的“大历史观”出发，特别是站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历史方位，人们需要精准理解“三农”问题对我国现代化的实践意义，需要深刻把握我国工农城乡关系演变的内在规律。

我国工农城乡关系演变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通过政府—市场关系调整而实现的。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工农关系经历了从农业支持工业、到工业反哺农业，再到产业协同发展的转变，城乡关系则经历了从农村支持城市，到城市支持农村，再到城乡融合发展的转变。上述转变折射的是国家发展战略从重工业优先发展，到经济增长导向，再到高质量发展的变迁，反映的是伴随着时序变化我国对工农城乡关系认识的深化。贯穿上述转变的根本逻辑是，中国共产党立足于现代化的整体目标和阶段性的约束条件，围绕政府—市场关系调整来形成经济制度，进而影响居民行为，配置城乡资源，转化产业结构，探索并完善工业化、城市化、农业农村现

代化的协同发展路径，并由此形成工农城乡关系演变的丰富政策、理论和思想体系。

我国工农城乡关系演变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城乡福利水平提高为目标。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工农城乡关系演变经历了三个阶段，在不同阶段，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指向并不相同，工农城乡关系的内涵、特征和绩效也存在差别。然而，工农城乡关系演变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城乡福利水平提高为根本指向。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耕者有其田”是为了赋予农民土地所有权，解放农村生产力并改善农民生活状况。计划经济时期的人民公社制、户籍制度和农产品统购统销制等加剧了城乡二元结构，但其支撑的国家工业化对经济社会的整体、长期发展具有重大作用。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实施的农村经营体制改革、城镇化战略、城乡统筹发展战略、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农村脱贫攻坚战、城乡融合发展战略等，均在积极回应我国发展面临的总量性、结构性挑战，依托制度变革和技术进步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城乡不平衡发展问题，促使城乡居民能够更为充分且相对均等地分享发展成果。

我国工农城乡关系演变的路径既有类似于国际经验的一般性，也有契合本土化特征的独特性。从跨国比较来看，一国的工农城乡关系演变往往体现为农业产值占比、农村劳动力和人口占比的下降，从时序角度看，我国工农城乡关系变迁也契合这些“国际经验”。然而，中国工农城乡关系演变在路径上具有鲜明的本土特征，其工农城乡关系演变与国家整体的发展战略紧密相关，其

需要推进二元经济结构和二元社会结构两种转变，其农业发展以农地集体所有制为制度基础，其农村劳动力流转向“农民工”方式进行，其城乡融合发展以城镇化和乡村振兴为两大引擎，其不同地区的农业农村发展模式存在差异等等。由此，我国在理论层面应提炼农业农村发展、城乡融合发展的本土化理论，在实践层面应立足于自身的发展阶段和目标位来确定相关公共政策。

我国工农城乡关系演变在现阶段被赋予了新内涵，并需继续探索新时代背景下的有效演变路径。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面临着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大使命。工农城乡关系演变在这一背景下被赋予了新内涵，例如，农村产业除具有提供食品的基础功能之外，还应具有提供生态和文化产品的衍生功能；农村在解决绝对贫困问题之后，应将重心转向解决相对贫困问题；在城乡要素流动的情形下，农村需要形成与要素动态流动相匹配的新型治理方式；工农城乡关系转变需关注其对畅通国内和国际循环、提升产品和科技创新的作用等等。基于此，我国需要探索和完善新时代的工农城乡关系演变路径，在党的领导下加强对“三农”工作、工农城乡关系的顶层设计，从整体和长远视角看待工农城乡关系转变的重大作用，依靠政府—市场的新组合形成城乡融合发展的新动能，在考虑地区差异的背景下激励地区因地制宜探索适宜的转变方式，在考虑农民和农村分化的基础上提高涉农政策的精准性和精确性。

（作者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继往开来的百年“三农”道路理论探索

叶超

“三农”问题始终是牵动乃至决定中国发展的关键。建党百年之际，同时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更是有必要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进行乡村建设和治理的经验，以开启新的征程。由上海交通大学顾海英和上海财经大学王常伟所著的《从耕者有其田到乡村振兴——中国特色“三农”道路的探索与发展》一书，就是这样一部既有历史感又有时代性的力作。

全书最大的优点或特点就是以历史为经，以“三农”为纬，在掌握丰富的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系统梳理了中国特色“三农”道路的形成路径及其脉络，进行了精炼的理论总结，并展望了未来，实现了历史与逻辑、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虽然主要内容分为农业、农村、农民三篇，但三者之间是有机联系的，这也是因为作者一开始就有了明确的立意并构建了清晰的框架，最后才形成了严谨有序的论证思路和逻辑。

将历史与现实联系起来，中国共产党百年不仅是关键的时间节点，也

是重要的经济、空间和社会范畴，农业、农村、农民“三农”问题分别对应这三个层面。三个层面虽各有侧重，但辩证统一。随着脱贫攻坚取得重大成效，未来“三农”问题的重点将转到社会空间建设和重构上。快速的城镇化使得城乡互动频繁，乡村充满流动性，每年近2000万乡村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这个体量是庞大的，预示着乡村振兴其实不能仅靠乡村，必须从城乡融合发展的视角考察和解决“三农”问题。

无论是革命、建设年代，还是改革开放和新时代，“三农”问题都是重中之重，也是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取得胜利和开创新局面的立足点。革命年代，正是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及时地确定了“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方向，通过扎根农村、依靠农民、改造农业，以弱胜强，逐步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1927年，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精准地描绘并预言：“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

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取舍。”近百年包括乡村建设和城乡融合发展的要诀恰在于“解放”二字。正是通过土地改革解放了农民，发展农业生产并建立了农村根据地，才使得党逐步立足并强大起来；正是通过解放思想，在农村率先改革建立联产承包责任制，才形成四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大好局面。经过百年的艰苦奋斗，中国共产党在乡村建设和治理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进入新时代后，乡村振兴上升为国家战略，更是说明了党领导解决“三农”问题的决心。以人民为中心的新型城镇化和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为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了指引。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教授）

破解“三农”问题，关键在党

张兆安

解决好我国的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事关农业增长、农村稳定、农民增收，更事关我国的农业能否实现现代化、农村能否走向繁荣富强、农民能否真正幸福安康。自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始终将破解“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在每一个历史关头都与时俱进地提出新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重大原则、工作部署、对策措施，不断地解决前进道路上的老问题和新矛盾。实践已经充分说明，破解“三农”问题，关键在党。

推动改革开放，关键在党。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进而做出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抉择，都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和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在这次全会上还形成了一项重要成果，那就是原则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决定（草案）》。这个《决定》不仅成为了拉开中国

农村改革序幕的标志，而且也宣告了中国开始迈入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征程。之后，农村体制改革取得重大进展，农业生产能力显著提高，农村经济全面繁荣，农村面貌发生变化，农民就业空间扩大，收入来源拓宽，农村民主法制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成效显著。同时，农村党的建设不断加强，有效夯实了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

推动全面发展，关键在党。1982年至1986年，中共中央连续发布“一号文件”，从理论和实践两个角度对中国农村体制改革进行了充分肯定和全面部署。在时隔18年之后，2004年至2021年，中共中央就“三农”问题继续每年下发“一号文件”，涉及促进农民增收、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发展现代农业、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统筹城乡发展、水利改革发展、农业科技自主创新、发展现代农业、深化农村改革、农业现代化建设、实现全面小康目标、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乡村振兴、抓好“三农”领域重点工作，以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等。由此可见，农业的发展、农村的进步、农民的富裕，都离不开党中央指明方向、明确任务、精准施策。

推动重大突破，关键在党。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始终围绕我国“三农”问题的重点、难点、焦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钉钉子精神不断地攻坚克难，取得了一系列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重大成果。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决定性成果，并且交出了一份人民满意、世界瞩目、可以载入史册的答卷。同时，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增收。所有这一切，都为进一步破解“三农”问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